

同时在打击播放黄色淫秽录像和各种流氓活动的斗争中,查处违法犯罪干部、职工 440 人,受党政纪处分 154 人。1988 年,查处各类违纪案件 248 件,党纪处分 202 人,其中福州市福港贸易公司经理重大诈骗、走私、行贿案,涉及省、市、县(区)、部队等 20 多个单位 33 人,包括处级干部 1 人、科级干部 7 人在内的党员干部 10 人。1989 年,结合“两院一部”通告,各级党委、纪委把惩治腐败,查处党内违法案件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年全市立案查处 791 件,是 1988 年立案数的 3.19 倍,其中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占 51%,涉及党员 918 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16 人,党纪处分 665 人。

1990 年,全市处理违反党纪的党员干部共 690 人。1991 年,立案查处党内违纪案件 574 件 666 人,党纪处分 534 人。1992 年,处分违法违纪党员 440 人。这 3 年中,分别突破一批重大经济违纪案件和处级党员干部受贿案件。1993 年 3 月,市纪委、市监察局合署。6 月,传达中纪委华东地区案件检查工作会议精神,当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自办案件和立案数上有新的进展,扭转案件检查工作在近一年时间内出现的滑坡现象。全年市纪委自办 25 个有影响的案件,全市新立案 626 件,党员干部 557 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尤其当年 8 月后,贯彻中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集中精力,重点查处“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全年立案中,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的案件占 106 件,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受贿和侵吞、挪用公款的案件占 15 件(万元以上 6 件),对查处集团违法违纪案件也有新的突破,受处分的党员、干部共 121 人。1994 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查处案件的力度,全市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 635 件 695 人,607 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经济类案件占立案总数 55.74%,比 1993 年上升 31.11%;大要案上升 82.98%;查处乡(科)级干部案件上升 34.55%;查处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案件上升 22%。

第四节 案件复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委纪委未设审理专门机构,对各类案件的审核、复查由各级党委负责。1952 年“三反”运动中,全市初定贪污总人数为 3638 人,贪污总金额 480 万元。经各级核实定案、复查后,贪污总人数降为 2680 人,贪污金额为 46.66 万元。

1955 年 9 月,市纪委内开始分工专人负责案件审理工作。1956 年 3 月,市监委制订《分工细则》、《关于处分党组织及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强调在审理案件中,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认真详细审核材料,尊重党员应有权利,克服履行手续上某些混乱现象。

1961 年 9 月,市委对 1957 年“反地方主义”斗争中案件进行甄别,结果原被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地方主义错误”和“右派分子”的党员干部,经审理并报省委批准,取消原处分决定,恢复党籍、职务和名誉。1961 年 11 月,市委对 1959 年 10 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斗争的 577 人进行甄别、平反。对 1960 年“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的 1842 人,其中定案处理的 209 人,进行核查。就已复查 934 个案件中,发现有不少错案。市监委为此作出关于“新三反”

定案处理的政策规定。1962年5月,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层层成立甄别机构,对福州市(包括当时所辖连江、罗源县)1958~1961年的“向党交心”、“双反双比”、“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等一系列运动中受批判(含未立案)和立案处理的党员、干部总数7482人进行审理、甄别,结果认定批判和立案处理错和基本错的4571人,占61.09%;批判和立案处理部分错的1650人,占22.05%;批判和立案处理正确和基本正确的1261人,占16.86%。其中受批判和立案处理的党员总数2438人中,批判和立案处理错和基本错的1619人,占66.41%;批判和立案处理部分错的504人,占20.67%;批判和立案处理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315人,占12.92%。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甄别平反工作尚不彻底。

1963年4月,贯彻全省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市委监委清理遗留积案432件,占积案总数91.14%,免于处分164人、党纪处分50人、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27人、检查批评186人、逮捕法办5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理工作职能为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取代。1972年开始,市革命委员会开展干部政策的落实工作,但由于“左”的干扰,进展不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县(区)纪检机关配合落实政策部门,本着“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和实事求是精神,受理、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的立案案件和党员干部申诉案件。至1987年,在受处分案件中,彻底平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右派、“中右”与“不纯”、“拔白旗”、“反右倾”、“四清”等运动和历史老案的冤假错案9289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4620件。恢复公职和给予妥善安置4202人、恢复党籍977人。

同时,市委全面开展对福州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福建亲信有牵连的人与事案件的复核与审理工作。至1982年底,解脱在1977年清查运动中被审查的510名干部、职工中的大多数,只定为严重错误3人、一般错误12人、打砸抢错误2人;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处分的3人,行政记大过处分的1人,党内警告处分的2人,其他处分1人。对在清查运动中被错拘、错捕、错判的54人,实事求是地安排工作。对不作结论的人员,本人写的检查材料,应退还的基本退还本人。

1985年,各级纪委重点开展关于中共地下党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党纪处分的复查审理工作。全市受理此类申诉631件,经复查,其中维持原处分35件、减轻原处分20件、平反纠正原处分576件。同年,另受理其他不服党纪处分的申诉案件134件,复查处理结案105件,当年结案率为78.35%,撤销原处分54件、减轻原处分24件,维持原处分27件。1986年,全市受理不服处理的申诉案件67件,当年查结37件,其中撤销原处分15件,减轻原处分16件,维持原处分6件。同年还清理历年积案72件。

1987年之后,各级纪委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开展办案质量的互检与自检,健全案件的案卷档案,交流与推广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组建胜任的专兼职审理工作队伍等措施,执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审理工作条例》,严格掌握政策,提高办案质量。1991年6月和1992年3月,市纪委组织5区、8县(市)纪委和市直纪工委开展办案质量检查,分别抽查87个、80个案卷,检查结果合格和基本合格为55件、65件,占案卷总数63.28%、81.25%。1992年检查中,罗源县、福清市、闽侯县、长乐县纪委被评为先进单位。1993年,市纪委

与市监察局合署后，理顺党纪案件审理和政纪案件审理的关系，不服处理的申诉案件逐步减少。1993~1994年，只受理不服处理的案件7件，复查处理结案7件，结案率为100%，其中减轻原处分2件、维持原处分5件。1994年10~11月，开展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工作，县（市）、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合格率100%，其中优质率占33%；市直各有关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合格率100%，其中优质率占50%。台江区、福清市、永泰县、连江县、长乐市的纪委、监察局被授予1994年福州市纪检监察案件质量先进单位的称号。

第八章 统一战线

民国15年（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委成立，就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民国36年12月，中共福州市委设统战委员，中共罗源县工委、中共长乐县委先后配备统战委员，中共连江北茭半岛地区中心工委配备敌工委员。1951年6月，中共福州市委设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市委统战部），各县、区委也相继成立统战部。“文化大革命”初，各级统战机构瘫痪。1971年9月，福州市革委会设立外事组，取代市委统战部的部分职能。1975年12月，恢复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节 搞好合作共事

民国15年（1926年）10月，中共福州地委组织宣传队，在闽系海军势力范围的连江县、闽侯县、长乐县的农村，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活动。同时，联合国民党人，做马尾海军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成功策反省防司令李生春和马尾系海军，配合北伐军顺利占领福州。北伐军入榕后，中共福州地委派遣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国民党福州党部下设的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民、妇女、青年委员会（部）负责人，掌握工农运动领导权。同时，利用北伐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派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分赴建瓯、宁德、莆田、仙游、南平、福安、永泰、古田等县，发动工农群众，筹组、扩大工农组织，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民国22年11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根据10月30日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纠正过去“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主张，并通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派来的潘汉年、张云逸对十九路军的工作，推动由十九路军将领组成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执行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释放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范式人、马立峰、蔡明善等人在内一批“政治犯”。同时，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出共产党员参加工会、农会、商会、学校、妇联和记联等组织活动；并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名义，在工人中间公开号召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福州分会负责人、党团书记张立到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作报告，同时发动组织“反对国民党飞机轰炸、援助十九路军士兵及国民党战争委员会”，到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同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来《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否定10月30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正确主

张，重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中共福州工委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国27年，中共连江县特支通过统战工作，发展县国民党抗敌后援会副会长吴大麟加入中国共产党，打开连江县抗日救亡工作的局面。民国34年，日本侵略军第二次侵占福州期间，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分别与长乐县、福清县国民党当局和地方武装达成协议，共同抗击日军。闽海游击队、下洋游击队主动配合国民党部队，联合出击日军据点，歼敌数十人；还派人打入南竿塘乡伪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促使伪和平救国军一个排长率17名士兵携带一批枪炮弹药加入抗日游击队伍。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福州地方组织迅速组成反美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帮助在福州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为民革前身）发展成员，扩大组织。民主党派人士林植夫、何公敢、李含阳、林浩藩、许显时等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支持、帮助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并团结发动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参加和平民主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教育界人士严叔夏、唐学咏、王西彦、谢投八、黄寿祺、陈芝美、沈维德（女，美籍教员）、吴从征、林素园；文化、新闻界人士郑书祥、林舒谦、路世坤、周问苍、郭风；工商、金融界人士王贤镇、倪松茂、邓炎辉、刘栋业、黄观云、高振云、毛一丰等，也为福州解放作了不少有益的事。民国38年5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建立工作站，重点开展上层统战和情报策反工作，争取原国民党海军最有威望的两位宿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留在福州，等待解放；联系原国民党海军人士，争取大批途经福州的海军将、校军官不去台湾。福州解放后，这批在闽原海军人员，有300多人加入人民海军队伍。在工作站联系发动下，各民主党派成员积极配合解放福州战役，在收集情报、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器材、策动国民党军警人员起义、投诚等工作中做出可贵的贡献。同年8月17日凌晨，福州爱国民主人士萨镇冰、丁超五、刘通、陈培锬、史家麟、何震、卢金三7人联合署名发布安民告示，张贴街头，拥护共产党，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1949年10月，从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中共福州市委通过协商选举，安排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和爱国民主人士为各级历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参加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组织他们参政议政，搞好党内外合作共事。1950年，市委帮助建立福州市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同年起至1954年，先后帮助农工党、民革、民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筹组以至正式成立市一级机构，发展成员，并逐步向基层延伸。1951年8月，市政府成立宗教事务处。与此同时，市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以及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团结发动他们参加支援前线、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接受教育，发挥作用。1955~1956年，在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市委、市政府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做好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调动工商界青年的积极性，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又引导和鼓励工商业者继续进行自我教育，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安排532名工商业者担任公司、企业、工厂科股级和门市部正副主任以上职务。与此同时，贯彻侨务工作方针，发挥归国华侨联谊会作用，建立政府侨务工作机构，按照“一视同仁，适

当照顾”的政策，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组织归侨、侨眷参加政治学习，安排归侨学生就学深造，做好国外华侨的接待工作，妥善安置回榕定居和工作的侨胞。对农村无地少地的归侨、侨眷，同样分给土地；对华侨地主的房屋和其他财产，给予适当照顾。1956年，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分。宗教工作，在全市基督教、天主教内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和反帝爱国宣传教育，争取、团结、教育教牧人员，帮助基督教、天主教实行自治、自传、自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积极开展对外国敌对势力渗透的斗争。对佛教界，恢复大寺庙正常宗教活动。少数民族在政府政策的保护下，得到发展。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市委统战部对各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动他们积极投身工农业生产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去。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市党外人士317人（含民主党派成员212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1958年的“整风交心”、“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批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受到错误的批判。1959年，市委统战部执行“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对民主党派宣布“四不”（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搞重点批判、不搞反右倾、不搞交心运动）；对原资产阶级实行“五不变”（政策不变，高薪不变、学衔学职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和平改造政策不变）；对工商界进行“顾一头、一边倒”（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的教育。同年起，分批摘掉部分党外人士的“右派分子”帽子，为受过错误批判的各界人士甄别平反。同时，帮助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采取“神仙会”形式，按照“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原则，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和风细雨地进行国内外形势和改造世界观的教育，并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数千人，分期分批地到市内参观访问，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收到自我教育的成效。1961年，市委对全市执行各项统战政策，重点是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帮助有关单位解决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开思想“疙瘩”，调整不适当的安排。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给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外知名人士以特殊照顾。对宗教界按照“主要方面抓紧，次要方面放松”的原则，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引导教徒爱国反帝，走社会主义道路。统战工作出现团结合作、生动活泼的局面，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促进形势好转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1962年、1964年两次批判统战工作中的“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统战工作出现曲折和失误。

“文化大革命”初，福州市各级统战机构瘫痪，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被迫停止活动，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被诬为“牛鬼蛇神”、“反革命”、“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等，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寺庙、教堂被迫关闭。1971年2月，市革委会设立外事组。1974年1月市委成立对台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开展侨务、对台工作。1975年12月，市委恢复建立统战部，但由于“左”的干扰，工作进展不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市委统战部帮助市民盟、民革、农工、民建4个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于1978年相继恢复组织，恢复活动，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统战工作仍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路线，贯彻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统战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市委统战部着手组织力量,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左”倾错误造成的各类冤假错案,恢复安排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进入人大、政协和政府工作,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市委、市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组稿广播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对台宣传;同时团结联系广大归侨、侨眷以及台胞和去台人员亲属,为他们落实政策,排忧解难。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成立接待站、接待小组,开辟台轮停泊点,接待从台湾、港澳和海外回来寻根问祖、探亲旅游、经贸考察、学术交流和投资兴业的各界人士。市委、市政府为海峡两岸民间经贸相互往来以及两岸居民互找亲属下落和赴港会亲、赴榕赴台定居,放宽政策,给予方便,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和侨务工作的发展。

1980年,市委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召开时隔18年未开过的代表大会,健全市一级领导班子;1982~1987年,又先后帮助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建立市一级机构,发展成员。至此,8个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市级机构及其基层组织均已全部建立。市委统战部进而帮助其解决办公用房、人员编制、阅读文件资料、用车等工作条件问题,保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顺利地开展活动。1982年,市委贯彻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加重视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协商工作,凡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地方建设大事,如机构调整、人事安排、经济体制改革、落实政策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都事先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座谈讨论,征求意见。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福州市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市委两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列席市委常委扩大会,一起商讨对外开放大计。同年6月,市委为加快落实统战政策的步伐,拨出专用的招工指标100名、迁进福州市户口指标100名、“农转非”指标100名、房屋50套(单元)及专款30万元。经检查,至同年9月在福州地区的全国、省、市、县(区)四级人大常委会的党外委员77人以及政协党外常委等565人的政策问题已基本落实。1985年开始,市委统战部恢复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双月座谈会制度。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发挥各自人才优势,开展调查研究、咨询服务、办学讲学和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活动,为福州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献计出力。1989年后,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建立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的季谈会制度、情况通报会制度、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政府成员会议制度和市、县、区党政领导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知名人士交友联系(每位领导交2~3名)制度。市、各县(区)聘任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25人、250人分别担任市、县(区)监察局、检察院、教委(教育局)、审计局的特约监督员,市直各部门聘请民主党派109人担任廉政监督员,有效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

80年代以来,市委进一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款重修重点寺庙、教堂,全市陆续开放375座寺庙、教堂;落实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房产951座、33.5万平方米,退还其在福州市区被改造、代管、漏管的13年租金、租息59.9万元;退还改造房79座3175.2

平方米和被拆、改建的房产 28 座 95 间 7939 平方米的月租收入 4728.77 元；恢复福州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爱国团体组织；平反冤假错案 118 人，收回安排 51 人，迁回被迫迁往农村户口 23 人，退还被冻结团体和个人存款 17.04 万元，补发工资 45 人、58 万元。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抵制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改革开放之机进行的宗教渗透；并安排宗教人士 66 人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方针，福州市和连江县、罗源县配备专职民族工作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支持畲乡发展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促进畲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市委、市政府着力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广泛宣传“一国两制”方针。以海内外各界人士组织的各类同乡会、联谊会为纽带，继续热情接待回国观光团。各级领导还应邀出境招商访问，开展联谊活动。1987 年 11 月后，根据海峡两岸政策的许可，市委、市政府为大陆居民直接赴台探亲提供方便，并组织两岸之间的文化、学术、科技、体育交流活动，榕台民间交往更加频繁。1991 年，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 15 号文件精神，开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投资者的统战工作。至 1994 年，非公有制经济的工商联会员已发展至 3515 家，占总数 70.6%，通过对他们进行爱国、敬业、守法教育，引导他们为发展福州经济作贡献。至 1994 年底，全市台胞来榕探亲 38.39 万人次、来榕定居 417 人；福州台胞台属赴港会亲 5784 人次，赴台探亲 6255 人次，赴台定居 353 人。全市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722 家，总投资 101.28 亿美元，协议外资 83.59 亿美元。已投产开业 1724 家，实际利用外资 24.6 亿美元。其中侨资企业占绝大多数。当年福州市年产值超亿元的侨资企业达 20 多家。全市批准台资项目 897 项，总投资 16.26 亿美元，协议台资额 13.58 亿美元，成为福州市继港资之后的第二大资金来源。全市“三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救灾扶贫，捐款逾人民币 10 亿元，设各类基金会 150 多个。侨商在福州开发的“三坊七巷”、元洪城、太平洋城、玉融花园、元洪花园等项目，兴办的融侨、元洪等连片工业开发区，组成的 17 家外资企业集团，对增长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实力和改善福州城市建设等方面作用明显。

第二节 党外人事安排

一、人大代表和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协商选举，福州市党外人士担任历届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简称人大常委）的有：

（一）全国人大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绮（民盟）、李芝卿（无党派）、陈桂贞（无党派）。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梁梅珠（无党派）、张华（无党派）。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敬铨（无党派）、林廷群（无党派）。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王维韞（无党派）、冯依森（无党派）、龚雄（无党派）。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王维韞（无党派）。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翔（民盟）。

(二) 省人大

省人大代表 从省第一届至第八届人大，福州市党外人士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共有 158 人次。

表 6-1-20

福州市党外人士当选历届福建省人大代表情况表

单位：人

省人大届别 代表分类		一 届	二 届	三 届	五 届	六 届	七 届	八 届
福州市出席省人大会议代表总人数		26	30	42	107	91	111	104
市属单位	代表人数	13	16	27	82	44	90	88
	其中党外代表人数	9	13	17	35	19	31	34
	党外代表占比例 (%)	69	81	63	43	43	34	39

注：1. 福州市出席省人大会议代表中有省属单位代表和市属单位代表；

2. 上述代表除第五届由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选举产生外，其余各届由市人大会议选举产生；

3. 省第四届人大因“文化大革命”影响未召开。

省人大常委 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高不危（九三学社）。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双月（致公党）、欧云远（民建）。

(三) 市人大

市人大代表 从市第一届至第三届各界人代和从市第一届至第十届人大（六届人大因“文化大革命”影响未召开），福州市党外人士被选为代表分别为 846 人次和 1539 人次。